

从“区域均衡”到“区域协同”: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苟兴朝¹,杨继瑞²

(1.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重庆 408100;2.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经济发展实践离不开经济思想的指导。纵观我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从“区域均衡”“区域非均衡”“区域协调”“区域统筹”到“区域协同”几个阶段的嬗变,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精髓的同时,紧密结合各自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创新与完善。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更有其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与时俱进的时代印记。在梳理新中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基础上,深入分析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阐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理论渊源。

关键词:区域均衡;区域协同;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7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3-0017-06

From "Regional Balance" to "Regional Synerg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ought

GOU Xing-chao¹, YANG Ji-rui²

(1.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cannot do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thought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of evolution from "regional equilibrium", "regional imbalance",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regional concordance" to "regional synergy", closely combining with the feature and the demand of their time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inherited the essence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and have constantly explored, innovated and improve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great theoretical courag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five generations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 only have vein blood relationship which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but also have imprints of times which time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new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though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mak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n the Marxist regional economy theory, and give a further explanation to theory origin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put forward by Chinese government.

Keywords: regional balance; regional synergy;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ough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一、引言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区域经济产生有三个原因:一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无论是流动性生产要素还是非流动性生产要素,其流动性都是不完全的。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区域经济结构差异的一个客观条件。二是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经济活动既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不能随意分割,又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不能随意分布。经济活动的集聚性和地域性,使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必然存在着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区

收稿日期:2018-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风险与农民权益保障研究(17BJY089);长江师范学院2017年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作者简介:苟兴朝(1973—),男,四川宣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不同的经济特征。三是距离成本。不同的区域,由于空间位置不同,距离成本也就不同,这就使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发展区域特点。这三个原因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区域性,也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区域性。

区域经济研究一个国家中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目的是要使各区域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在分工基础上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实现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1]。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目的是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出发,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通过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实现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经济问题,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区域经济学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学也从无到有,从最初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域经济理论到“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统筹发展”,再到“区域协同发展”,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精髓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出与时俱进的区域发展思想。本文将在梳理新中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基础上,深入分析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阐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承与创新

(一)马克思恩格斯及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

区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区域经济布局问题。区域经济布局是生产力各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和相互联系状态,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后,提出了生产力平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竞相追逐高额垄断利润,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状况只有在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

能得以解决,原因在于,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社会有可能在空间上合理布局社会生产力^[3]。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才能实现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两方面阐释了如何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一是尽可能地在原材料产地进行工业生产。他们认为,为了减少生产费用和增加产出,工业生产应尽可能在原材料产地、产品消费区以及交通便利之地进行。二是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后,应大量建立国家工厂、增加生产工具,并将农业和工业有机结合起来,逐步消除城乡对立状态^[4]。

2. 区域均衡发展:毛泽东时代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即为“均衡布局论”。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中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发展,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发展”。在沿海和内地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并不是弱化沿海工业,而是恰恰相反,若要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必须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5]。20世纪60年代,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等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又提出了向中西部倾斜的经济政策,要求加强“三线建设”,以“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

在毛泽东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沿海轻内地的生产力布局得以较大程度的扭转,以重工业为基础、门类较为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在内地也相继建立起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得以较大程度的改观。

3. “非均衡发展”:邓小平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在区域均衡发展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尽管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沿海轻内地的生产力布局问题,建构起了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雏形,但经济效益问题在这种明显带有平均主义价值取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中被严重忽视,东部

地区与宝贵的发展机会失之交臂,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1953年至1978年,中国在这种均衡布局的模式下,既“没有达到使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益与沿海地区均衡的目的,又人为地抑制了沿海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6]。

20世纪70年代末,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构想,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孕育而生。在邓小平看来,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对于均衡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邓小平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7]。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凝练其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提出了“两个大局”战略:内地首先支持沿海地区的发展,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再反过来支持内地的发展。

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蕴含着效率优先的政策取向。在此思想指导下,一方面,广大沿海地区的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全方位立体交叉的开放格局,为我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伴随着东部地区迅速崛起的同时,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非均衡现象依然严重。

4. 区域协调发展:江泽民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系统地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江泽民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8]。1996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指出:“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主要是通过向内地辐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向内地投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改造内地的一些老企业,以及对口扶助内地一些贫困地区脱贫方式来进行”。

在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指引下,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东部地区良好发展态势依然不减,东西部地区发展呈现出了并驾齐驱的良好局面,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5. 区域统筹发展:胡锦涛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系列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显现:

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育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较低的科技发展水平等严重影响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并且存在较为严重的浪费现象;在国家建设资金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东西部地区得到重视而得以优先发展,东西部与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生态恶化、环境破坏以及资源日益耗竭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横亘在发展道路上^[9]。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六大以后,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再次调整了区域经济发展思路,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区域统筹发展。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10]。

在区域统筹发展思想指导下,东部地区良好发展势头日盛,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日益凸显,东北地区也渐次走上了复兴之路,区域间经济因地制宜、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基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也驶入了正确轨道。

6. 协同发展:习近平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系统谋划了新时期我国发展空间布局的新战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思想。2013年5月,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河北发展问题研究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3年9月,在出访中亚四国时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要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至此,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为代表的习近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思想正式形成。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选择,它突破了原有区域政策囿于国内的局限,强调内外联动,在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内调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

和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建设也是当前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的主要“着力点”。

(二)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1. 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嬗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平衡布局、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到邓小平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江泽民的区域协调发展,再到胡锦涛的区域统筹发展和习近平的区域协同发展,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都是以坚持生产力合理布局为基本指导思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进步为最终目标。

从本质上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及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表述略有不同,但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为价值取向

的。从战略原则角度审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协调发展到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相继提出的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以及协同发展,尽管因各个时代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不同而选择的战略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最终的战略目标都归一为缩小区域间贫富差距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虽然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与协同发展在表述上貌似相背离,但其战略落脚点仍然是通过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战略推行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形成的多层次、有重点、全方位立体交叉、由东至西再至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泽民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落实,21世纪初胡锦涛提出的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还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都大致遵循了由点到线再到面、从局部到总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区域发展逻辑。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区域发展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区域发展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区域均衡发展	区域非均衡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统筹发展	区域协同发展
实施背景	生产力水平低且分布不均;西方国家军事威胁、经济封锁	地区经济不平衡;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地区间矛盾突出	西部投资效益差、浪费严重;中部塌陷;生态环境破坏	经济发展新常态;美日等西方国家阻挠中国和平崛起
发展理念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生态协调与共享发展
发展目标	摆脱贫困、国家安全	先富带后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生态环境良好	共同富裕;生态环境好;共赢与互惠
发展层次	中观	中观	中观和宏观	宏观	宏观
发展重点	西部地区、“三线”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中、西及东北	东、中、西、东北及沿线国家和地区
政策取向	公平优先	效率优先	效率与公平兼顾	公平与效率兼顾	公平与效率兼顾

2. 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纵观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吸收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精髓的同时,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结合各自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完善与创新。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更有其明显的随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适时调整的时代烙印。

(1)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以根本解决。他们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平衡布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是在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将首先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预测基础上提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表明并非如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的是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区域发展不仅有差距且生产

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国家如何合理布局生产力的全新问题。鉴于新中国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发育极不充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孕育而成,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国内形势等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平衡布局生产力思想指导下,在坚持生产“尽可能接近原料、燃料产地”的原则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利于国防安全”“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及区域间“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生产力布局原则。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是马克思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2) 邓小平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不可否认,在毛泽东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西部地区工业和经济薄弱的面貌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也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区域均衡发展思想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平均主义使东部地区错失了加快发展良机,在总体上延缓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最终也使西部地区逐渐丧失了进一步发展动力。

在秉持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区域均衡发展理念的同时,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时代主题的世界形势研判,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非均衡发展战略蕴含着抓住和解决事物的主要矛盾有利于解决其他次要矛盾的哲理。在邓小平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总量太小、经济效率低下以及国民整体贫困是主要矛盾,而分配公平问题是次要矛盾,较之均衡发展更亟待解决的是优先发展。据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的具体战略是“两个大局”。“两个大局”是邓小平在既注重世界经济共性又注重各自国家个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两个大局”发展战略既体现了由非均衡到均衡的世界经济发展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经济发展个性。邓小平认为,基于底子薄、基础差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要在发展目标上分步骤进行,而且在发展格局上也要分阶段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区域均衡发展思想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成果。

(3) 江泽民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在邓小平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东部地区、沿江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但伴随着东部地区和沿江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东西部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邓小平“两个大局”构想中的第一个大局基本实现,落实和完成第二个大局构想的历史使命被赋予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肩上。

在此背景下,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强调发挥区域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对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两个大局”战略的进一步贯彻与实施。“西部大开发”重点要解决的是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但其根本落脚点并不只是局限于发展西部地区,而是通过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西部大开发”在战略推行层面上有别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主要依靠政府计划手段的做法,在加大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宏观调控力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4) 胡锦涛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大为改善。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伴随着东部和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中部地区经济塌陷、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亟待转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区域间各自为政、区域性壁垒等发展中的新问题和深层次问题不断显现,进而演化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针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了统筹发展思想。统筹发展不仅要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要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以及国内与国外发展。显而易见,较之区域均衡和区域协调,统筹发展是不仅注重发展速度而且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层次更高的区域发展观。统筹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创新意义在于其将区域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由人、自然、社会以及世界构成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推进。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5) 习近平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

在继承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统

筹发展等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协同发展战略构想。协同含有协调一致、团结统一、协助以及互相配合之意,其内涵较之均衡、协调以及统筹更为宽泛。就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两者区别而言,协调强调缩小要素之间的差距,而协同强调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协调强调要素之间的同一,而协同不仅强调同一,更强调要素之间的斗争以及同一与斗争产生的协同效应;协调强调各要素对系统目标的服从和贡献,而协同发展强调要素之间的共赢与互惠^[1]。协同发展内涵着公平、协调、开放、共享等发展思想。公平和共享是指区域经济发展机遇和结果公平、发展成果惠及区域内和区际间所有国家和人民,这与“协同发展强调要素之间的共赢与互惠”相契合;公平和共享是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协调和开放是指区域内和区域间友好相处、合作互惠和开放借鉴,实现共赢与互惠;协调和开放是区域发展的路径抉择。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的重大创新。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两大战略主要致力于解决国内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那么,“一带一路”是通过跳出中国发展中国、跳出局部发展全局的大战略,其战略眼光已拓展至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它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两大战略是国内空间发展战略,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空间战略,又是经济、政治、文化战略,是东西方国家发展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携手并进的战略”^[12];如果说邓

小平的“两个大局”是统筹国内东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那么,“一带一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是着眼于沿线国家共同需求的国际性协调区域发展战略,是着力于缩小区域差异的共赢共享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实践途径”^[13]。

习近平的协同发展思想既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以及统筹发展同源,又超越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统筹发展之上,是层次和境界更高的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状态。区域协同发展思想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更高层次的创新。

三、结语

经济发展实践离不开经济思想的指导。我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从“区域均衡”“区域非均衡”“区域协调”“区域统筹”到“区域协同”几个阶段的嬗变。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精髓的同时,紧密结合各自时代特征与时代要求,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创新。从本质上看,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更有其显著的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与时俱进的时代印记。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倡议,其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惠及沿线乃至世界各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思想又一次伟大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顾钰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2.
- [2] 王振宇.马克思恩格斯区域协调思想研究[J].实事求是,2011(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0.
- [6] 安慧玉.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与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比较[J].学术交流,2009(2):75.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71.
- [9] 高新才.与时俱进: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嬗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
- [10] 郭丽.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四代领导人区域经济思想的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122.
- [11] 王力年.区域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理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30.
- [12] 周文,方茜.“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0):62-72.
- [13] 刘美平.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视阈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略[J].区域经济评论,2016(2).